

新时代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刍议

Toward an Ancient-Modern Balanced Developing Approach for China's Museum Enterprise in the New Era

黄春雨

Huang Chunyu

(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内容提要: 回顾我国博物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不难发现, 无论是薄今厚古, 还是厚今薄古都不能使中国博物馆走上正确、专业的发展道路。新时代的中国博物馆需要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既要厚古也要重今, 将记录、见证、参与中国社会的进程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创造性地努力奋斗, 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 真正实现博物馆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关键词: 教育博物馆 科学博物馆 地志博物馆 厚古薄今 厚今薄古 古今并重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useums is over 100 years. In retrospect, neither the concept favoring the ancient approach nor the one favoring modern methods could guide China's museum enterprise to a sound and professional path of development. Chinese museums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a complex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ancient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life, recording and participating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society, as well as striving with creativity for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lastly, authentically putting museums' purpose of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the public into effect.

Key Words: Museum of education; science museum; museum of chorography; ancient favour; modern favour; ancient-modern balance

一、1949年之前我国博物馆发展方向的考察与思考

我国的博物馆从发端起就被仁人志士赋予鲜

明的历史使命, 博物馆的建设发展与“自强”“求富”“救亡图存”的民族命运相连。随着时代潮流, 呼应着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 具有明显的重今轻古色彩。

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文化、辅助民众教育、开启民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建立博物馆主要目的。“广国民之新识”^[1]“佐读书之不逮”“为进化之考据”^[2]“以为通商之助”^[3]的教育与科学博物馆，成为旧中国博物馆的主流。

1896年，李鸿章去俄国祝贺尼古拉二世加冕，途经英国参观了肯辛顿博物馆，“中堂于机器木模、自古至今历代所变而精益者，无不留心垂察，喜形于色”^[4]。《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的作者就此评论到“说者谓华人以守古为高，而中堂独以更新为喜，中国有大臣如此，何忧国之不兴”^[5]。梁启超在《论学会》中，提出学会应办的十六项事，其中第十二项就是“大陈各种仪器，开博物馆，以助试验”^[6]。支持和传播改良思想的上海强学会，将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楼、开博物馆视为最重要改变中国命运的四件事，并提出了举办博物馆的具体设想：

“凡古今中外，兵农工商各种新器，如新式铁舰、轮车、水雷、火器，及各种电学、化学、光学、重学、天学、地学、物学、医学诸图器，各种矿质及动植物类，皆为备购，博览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7]

清朝末年，商部（后与工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和学部分别于1903年和1905年设立，成为主导博物馆建设的政府主管机构，劝业型博物馆、教育博物馆开始陆续出现。如，天津博物院的源头天津考工厂^[8]、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源头陕西劝工陈列所^[9]，学部侍郎严修在天津创办的教育品陈列室、广东学务处开办的图书及教育品物陈列室、湖南省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泰安教育博物馆等。1905年，清末著名实业家与教育家张謇在南通师范学院创办了以“为本校师范生备物理上之实验，为地方人民广农业上之知识”为宗旨^[10]的南通博物苑。可以说，南通博物苑的成立既是张謇希望博物馆助力“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具体实践，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社会赋予博物馆的历史重任。

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了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指导和管理全国博物馆的建设，博物馆成为当时国民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教育博物馆及科学博物馆与“工业救

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乃至“卫生救国”等社会思潮相呼应，继续占据中华民国博物馆发展的主流地位。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1911年至1921年全国已有博物馆13座，绝大多数为教育博物馆及科学博物馆。如，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博物馆（1913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陈列馆（1916年）、保定教育博物院（1916年）、天津博物院（1918年）、江西省立教育博物馆（1918年）、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1919年）。中国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突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11]。这个印记也明显地刻在了作为近代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博物馆身上。

1936年7月，中国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在青岛召开。《青岛日报》为此刊登了《对于中国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的希望》：“欲建设现代国家，必须利用先进各国之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因之搜集现代科学资料，以供国人参考，诚为当务之急，而吾先民之经验，无论哲、理、文史之学，及科学、工艺之造诣，有湮而不彰者。因之搜集保存往昔图籍，进而考订研究，制成各种模型、图表，阐幽表微，以复昌国故，犹不容忽视。”^[12]可以说，《青岛日报》的期望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对博物馆的期望，收集现代科学资料，传播先进文化技术，助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为博物馆的首要职责，属“当务之急”，而保护历史文物则似乎处于“不容忽视”的次要地位。

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之际，当时的教育部曾通令国统区各省，要求各省都要成立一座科学馆，这既可以看作民国时期政府对于发展什么类型博物馆的一种倾向性的认识，也可视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科学博物馆，提高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应对强敌入侵的教育战略。成立于1934年的广西省立博物馆在10年之后，因此改组为广西省立科学馆^[13]。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建立的为数不少的省级博物馆，如山西博物院、安徽省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贵州

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均和科学博物馆或科学馆有程度不同的渊源。

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教育部尽力主导教育科学类博物馆发展，最终因人才和藏品的制约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而最能体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以历史文物为基础的历史类博物馆，又因当时社会存在的对传统文化能否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怀疑，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博物馆事业道路的考察与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地赋予了宣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被视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成为博物馆的基本任务，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成为那个时期博物馆的主要任务。

1951年，文化部《对地方博物馆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发出后，各地开始了地志博物馆的建设，“自然富源”“历史发展”“民众建设”（后改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陈列内容。地志博物馆在中国的建设和实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对博物馆的要求，期望博物馆能够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1956年王冶秋在全国地志博物馆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就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三部分陈列那个更重要做了这样的回答：“三部分都重要，但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更重要，这部分陈列是整个陈列的重点。山东博物馆前两部分比较好，可是越往后越没劲，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历史部分虽然是光辉灿烂，但已是过去，对于我们更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14]古为今用成为那个时期国家文物局处理古代文化和现实需求的基本方针。“我们主要的

是通过物质文化遗存或正在创造发明的东西，来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几亿人们正在创造崭新的历史，不是为了玩古董。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古为今用、今为今用；对古代文化遗产，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来进行整理研究。”^[15]

地志博物馆是一个集历史、自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收藏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值得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并未能获得与那个时代要求同步性的发展。是过度政治化引起博物馆人的消极应对，还是那时的我国博物馆不具备收藏当代文物的专业能力，抑或多种因素的叠加？总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部分逐渐被弱化。地志博物馆一步步朝着以古代文物为中心的博物馆方向发展。

三、我国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应该走古今并重发展之路的探讨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博物馆泛政治化状况基本改善，逐步走向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后，曾经对我国博物馆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地志博物馆模式逐渐被放弃，国家文物局体制内博物馆人的热情和工作基本上聚焦在了对古代历史文物的研究、展览上（革命纪念馆不是本文探讨的主体）。反映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的展览少之又少，就笔者掌握的情况而言，将其作为基本陈列的似乎仅有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和深圳博物馆的“深圳改革开放史”，临时展览虽有一些，但基本上属于摄影展或图片展，而且大多数并非博物馆的自主策划。我国博物馆似乎回到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被批判的厚古薄今的道路上。

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瑞典博物馆发起了“为了未来而收集文物”的运动。这个运动强调

博物馆不但应该保存过去的文物，也应该保存现在正在使用的器物。因为，当代文物的收集和著录具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当代文物的收集和著录具有实践性和可行性，有些信息稍纵即逝，必须把握住机会；当代文物具有科学性，收集当代文物容易掌握其非物质方面——价值观念和思想，便于人们联系当代的背景开展研究工作，实现博物馆的理想和宗旨。为了实施这项计划，以瑞典国家博物馆为核心，建立了当代文物收集合作与协调委员会，全国有80个博物馆参加了这项工作。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收集当代文物计划。不列颠博物院的收集政策明确指出：不列颠博物院期能获取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迄于当代的物质，目的在于记录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增加有关的知识，增进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了解，以加强对公众的启迪，扩大他们的娱乐范围。

经过长期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当代中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中华民族正在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2016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深圳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贺信中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国博物馆不能也不应该置身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外，我们必须将古老的文明与当代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积极、专业地记录、见证、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收藏、展示、诠释中国精神、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既要厚古也要重今的角度去认知我国博物馆的当代责任，古今并重地建设和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对我国博物馆的期待，更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

走古今并重的发展道路，需要我国博物馆特别是历史类博物馆真正转变观念，既要厚古，更要以为明天收集今天的理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发生的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乃至改变世界的历史事件为经纬，以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中国故事为节点，科学、专业地做好博物馆藏品的收集规划和计划，充分运用信息技术以及一切可用的新技术、新手段，多角度地收集、记录和展示当代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所进行的伟大实践。走古今并重的发展道路，不仅需要我国博物馆转变观念，更需要付诸行动，不懈坚持。要通过各种评估考核引导我国博物馆朝着古今并重的道路不断前行。

四、结语

我国博物馆发展历程说明无论是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都不能使我国的博物馆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时代去探寻我国博物馆事业的新征程。值此纪念天津博物馆走过100年历程之际，希望本文可以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引起更多的我国博物馆人去思考我国博物馆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能保存、记录、见证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注释

- [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0页。
- [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列国游记——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 [3] 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9页。
- [4] 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 [5] 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 [6]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76页。
- [7]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91页。
- [8] 陆惠元：《天津考工厂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1期。
- [9] 张礼智：《陕西博物馆百年史》，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20、21页。
- [10] 《博物苑观览简章》，南通博物苑藏。
- [11] 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第4-13页。
- [12] 《对于中国图书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联合年会的希望》，《青岛日报》1936年7月21日。
- [13] 黄启善：《广西博物馆60年发展史略》，《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3期。
- [14] 国家文物局编：《王冶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 [15] 国家文物局编：《王冶秋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3、74页。